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王美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综述了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 迁移劳动力汇款的情况, 以及影响迁移者汇款行为和汇款数量的因素; 迁移者的收入如何改善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 迁移者的收入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的投资; 迁移者的回流行为, 以及影响迁移者回流决策的因素; 回流劳动力对家乡经济多样化的影响; 迁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以及迁移如何影响家乡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文章指出, 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将持续, 而且会更加深远。

关键词: 迁移 农村经济

改革以来,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而复杂的。一段时间以来, 在研究迁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方面, 相关文献的研究侧重点大多集中在迁移对迁移者个人、或迁入地的影响方面, 而在迁移对迁出地即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方面, 研究却相对不足。近年来,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谈到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时, 人们很自然地会关心以下一些问题: ①迁移者在外就业挣得收入后是否会给家乡寄回或带回现金, 哪些因素影响其汇款或带回现金的数量; ②迁移者的打工收入是否会改善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 ③迁移对于缓解农村贫困有无作用; ④迁移是否会影响农村的家庭投资; ⑤在外打工者中, 是否有人回流到农村, 回流状况近些年有何变化, 回流的劳动力有何特征, 回到家乡后, 他们在做什么; ⑥有迁移者的家庭是否会因为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 造成农业生产水平降低; ⑦迁移对家乡农民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是否存在影响, 等等。目前, 学者们对这些问题, 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本文从学者们对以上问题的回答着眼, 对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综述。

一、移民汇款行为与农民收入

由于中国存在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及其在城市永久工作和居住下来的制度, 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是只身外出, 其余家庭成员留在家乡, 当然, 也有举家外出的。不论是何种情况, 外出劳动力与其家乡通常有着密切的联系。迁移者与家乡在经济方面的联系如何呢? 研究表明, 外出劳动力将在城市挣得的收入, 去除自己在城市的花费后, 将剩余收入的一部分寄回家乡。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1999年在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数据, 1999年外出 3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每月寄回或带回的现金为 298元(白南生等, 2002)。

哪些因素影响迁移者的汇款行为和汇款数量呢? 白南生等人(2002)发现,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男性、已婚、年龄大、家庭人口多和外出就业的时间长等因素, 都倾向于提高迁移者寄回或带回家乡的钱的数量。罗斯高等人(Rozelle et al., 1999)利用 1995年在河北和辽宁两省 31个

村得到的农户调查资料,以及 1996年在这 31个村调查得到的村一级的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果:承包土地调整的幅度越大,迁移者的汇款越少。土地再调整的幅度越大,迁移者对土地分配的不确定感就越强,他们对土地的投资意愿也就降低,汇款也就随之减少。

与其他任何经济行为一样,迁移也是人们的一种理性选择。人们在选择是否迁移时,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例如,在城市的预期收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以及在家乡的收入等。当然,迁移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例如,从家乡到迁移目的地的交通费用、寻找工作的费用以及心理成本等。通常来说,一个劳动力迁移后的收入会比其在家乡的收入高出一定程度(Todaro 1969)。那么,迁移劳动力的收入是否会改善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呢?

根据一些学者(Lucas and Stark 1985)的研究,迁移动机的利他性的程度决定了迁移收入转移的数量。如果迁移动机是“自利”性的,那么,迁移者迁移后的收入可能仅仅会改善自身的福利状况,而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影响甚微。相反,如果迁移动机是“利他”性的,那么,迁移将会对家庭中其他贫困人口的福利有帮助。都阳和 Pak(2003a)利用对中国西部地区 4个贫困县所做的农户调查资料,对决定迁移者收入转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迁移动机的“利他”性假设符合贫困地区的样本,而且贫困家庭的迁移成员对改善其他家庭成员的贫困状态有更为积极的反应,他们的收入转移的比例在 40%以上。

很显然,贫困家庭中的迁移劳动力的收入对于整个家庭的意义,较之富裕家庭,应该要大得多。对于富裕家庭来说,迁移劳动力的收入会使家庭的收入水平更上一层楼;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迁移劳动力的收入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经济面貌。都阳和 Pak(2003b)根据上面研究的数据,提出迁移者的“利他”性动机对缓解家庭贫困有着积极的影响;迁移行为不仅在贫困地区越来越普遍,而且已经成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最重要的方式。

那么,迁移者的收入对于农村家庭的投资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de Brauw 和 Rozele(2005)利用 2000年在 6个省(河北、辽宁、陕西、浙江、湖北和四川)农村随机选择的 60个村 119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就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他们发现,1995~2000年,迁移和回迁的农户进行的投资多于非迁移农户的投资。在那些贫困的地区,由于投资环境相对较差,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会促进农户用于提高当前生活水平的消费性投资的增长,促进投资增长的幅度接近 20%;但是,没有发现迁移与用于提高家庭生产能力的生产性投资之间的联系。赵耀辉(2002)依据农业部 1999年在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和浙江 6省进行的调查数据指出,有回迁者的家庭通常拥有更多的耐用消费品、房宅和生产性机械等。这样的农户更可能投资于农田所需的机械,且回迁越早,在农田所需机械上的投资越多。

二、对迁移者回流行为的考察

从微观角度看,迁移者的个人回流行为受一系列个人因素影响;从宏观上观察,迁移人群的回流规模和比例因每个地区大规模外出开始的时间和目的地类型等多种因素的差异而不同。有研究指出,在江苏省北部,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数量占迁移总数的 1/4(蔡, 2000)。白南生等人(2002)通过对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回流人数占外出或曾外出劳动力的 28.5%。Hare(1999)对 1995年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河南省的一个县中,回迁的人很少。Murphy(1999)的研究发现,在江西南部两个县所调查的样本中,仅有 1/3的迁移劳动力返回家乡。赵耀辉(2002)发现,到 1998年底,样本的所有迁移者中,有 38.4%的外出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家乡。

这些研究都表明,虽然农村劳动力的回流与外出相比,总体规模仍然有限,但是,外出后回流仍

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回流决策呢?赵耀辉(2002)发现,受教育水平、年龄、婚姻状况等都是影响回流决策的重要因素。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已婚且配偶从未迁移过的劳动力,更倾向于回流到家乡。Hare(1999)的研究证实,在目的地的“失败”,并不是迁移者返回家乡的决定性原因。Wang和Fan(2005)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在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数据,将回流者归为成功者、失败者和因家庭原因被迫回流者三类^①。他们的研究发现,因家庭原因被迫回流者成为回流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失败者,成功者在回流者中占的比例很小。白南生等人(2002)的研究发现,子女上学已经成为影响劳动力回流的一个重要事件。有近10%的回流劳动力把孩子上学作为回乡的一个原因。

一些研究显示,迁移回流者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经过了迁移生活的洗礼,在城市生活和非农就业中积累了资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技能和见识,也增加了某些方面的工作经验,他们返回家乡后具有较强的创业能力。赵耀辉(2002)发现,略低于一半的回流者又完全从事农业,而在未迁移者中,从事农业的比例超过一半。在控制了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特征后,回迁的劳动力就业于农业的可能性并不比未迁移的劳动力小。Wang和Fan(2005)的研究发现,在安徽和四川两省的样本中,仅有2%的回流者打算返回后进行投资。

Murphy(1999)却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他观察到在江西南部的两个县里,回迁的劳动力正在对促进其家乡经济的多样化做出贡献。但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还仅局限于为其他回流者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为当地的未迁移者。由于其家乡经济的落后和回流者返回家乡的时间较短,回流者中的企业家在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和农村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利用对2000多个回流者的调查资料,马忠东(2001;2002)也得出了回流者对家乡经济多样化起着主要作用的结论。而且他还指出,这些回流者促进了其家乡的企业活动。白南生等人(2002)的研究则认为,回乡创业对家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化的推进和农业结构的调整上,对农村工业化的贡献相对较小。

三、迁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或更多的劳动力迁移出去,留在家中的劳动力就会减少,农业生产水平是否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呢?杜鹰等人(1997)利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较多的四川和安徽两省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比较,证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或提高。不过,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对家庭畜牧业有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这种观察与刘易斯(1954)关于农业中边际劳动生产力为零或负数的假说,以及大多数学者关于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观察是一致的。

关于这一点也有不同的观点。与对于工业生产的作用相同,资金和劳动对于农业生产,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企业、家庭或个人通常会将自己拥有的资金和劳动力在生产中进行合理配置,使其实现效用最大化。在一个家庭的承包土地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和资金不同,产出也会不同。罗斯高等人(Rozelle et al, 1999)的研究发现,迁移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而且显著。当一个家庭成员迁移出去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时,产出急剧下降。另一方面,迁移减少了家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但外出劳动力给家中的汇款,却增加了家庭的资金。也就是说,迁移对家庭农业生产的影响应该是双重的。杜鹰等人(1997)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

^① 成功者是指打算回流后在家乡从事投资活动者;失败者是指在城市难以找到工作而不得不返回家乡者;因家庭原因被迫回流者是指那些要返回家乡结婚或生小孩、或需要照顾在家乡的其他家庭成员而不得不回流的人。

现,目前发生的土地转包规模是很小的,有外出者的农户在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紧张时,首先考虑的是在大家庭和亲戚范围内的合作。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用外出者挣到的钱可以多买化肥。如果将迁移所带来的家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减少与迁移所带来的家庭资金的增加相比较,这两个方面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的呢?

罗斯高等人 (Rozelle et al, 1999)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尽管迁移对农业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但是,这种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迁移者给家中的汇款从而带来的家庭资金的增加所抵消。每增加一元的汇款会使得每亩产出增加 0.44 斤。迁移越多,汇款也越多。迁移者每增加一个人,家中的汇款收入就增加 819 元。但是,在他们所使用的河北省和辽宁省的样本中,汇款只是部分抵消了迁移对农业产出带来的负向影响。迁移对产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之和为:每增加一个迁移者,农业产出每亩减少 101 斤 (占平均产出的 14%)。作者据此推断,如果样本能够代表全国,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粮食产出增长速度的降低,或许可以说是迁移不断增加带来的。但是,由于平均 5 个家庭中才有 1 个家庭有迁移者,这对粮食总供给的净影响最多只有几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受到城市生活的熏染,他们会在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方式上发生变化。他们的这些变化又会通过各种途径,对家乡农民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白南生等人 (2002)通过个案访谈,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外出者及回流者发挥着载体功能,将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传播到农村;外出就业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生活适应能力和生产经营能力;外出就业经历可以影响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外出就业也会对子女教育和家庭关系等产生各种影响。有意思的是,一些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也在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结构。周大鸣 (2003)通过对在江西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看到,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结构的影响与村民民主选举密不可分。很多村民已经倾向于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党支部书记。村长和党支部书记如果没有外出的经历,没有致富的经验,就难以做下去。

通过以上总结,我们看到了迁移对农村经济在若干方面产生的影响。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正在继续,这一过程将长期进行下去。未来随着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不断被削弱以至消除,劳动力流动将变得更加顺畅,迁移者在城市的生活、就业和社会地位状况也将得到很大改观。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无疑将持续,而且会更加深远。这有待学者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 [1] de Brauw, A lan 和 Scott Rozelle:《迁移与中国农村的家庭投资》,载《中国劳动经济学》2005 年第 2 卷第 2 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
- [2] Hare, Denise (1999), "Push versus Pull Factors in Migration Outflows and Returns: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Status and Spell Dur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5, No. 3
- [3]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22 (May).
- [4] Lucas, R. E. and O. Stark (1985),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3.
- [5] Ma Zhongdong (2001), "Urban labour-force experi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 change: 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
- [6] Ma Zhongdong (2002), "Social capital mobilization and income returns to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return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

- [29]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期。
- [30]刘吉元:《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
- [31]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 [32]李运萍:《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收入与学历关系分析》,《职教通讯: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 [33]任国强:《农户教育水平和培训对农户就业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杭州,2004年6月。
- [34]任国强:《农民非农收入决定因素研究——以天津的实证分析为例》,第五届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参选论文,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http://www.cenet.org.cn>),2005年12月。
- [35]任国强:《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天津的考察》,《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
- [36]王洪春、阮宜胜:《中国民工潮的经济学分析》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
- [37]魏众:《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 [38]杨冠军:《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五大特点》,《中国信息报》1999年6月24日。
- [39]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管理世界》1997年第5期。
- [40]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 [41]朱玲:《西藏农牧民非农就业机会》,《科学决策》2004年第2期。
- [42]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 [43]张林秀、霍艾米、罗斯高等:《经济波动中农户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0年第5期。
- [44]张照新、宋洪远《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主要观点综述》,《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慧芬)

(上接第73页)

- [7]Murphy Rachel (1999), "Return Migration Entrepreneurs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Two Counties in South Jiangxi,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1
- [8]Rozele Scott J Edward Taylor and Alan de Brauw (1999),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One Hundred El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9]Todaro M.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1
- [10]Wang Winnie Wenfei and C Cindy Fan (2005),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forthcoming
- [11]Zhao Yaohui (2002),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0, No 2
- [12]白南生、宋洪远等:《回乡,还是进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
- [13]蔡 :《中国流动人口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14]都阳 Albert Park:《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a),《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4期。
- [15]都阳 Albert Park:《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b),《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5期。
- [16]杜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 [17]周大鸣:《外出务工与输出地政治结构的变迁》,载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责任编辑:王慧敏)